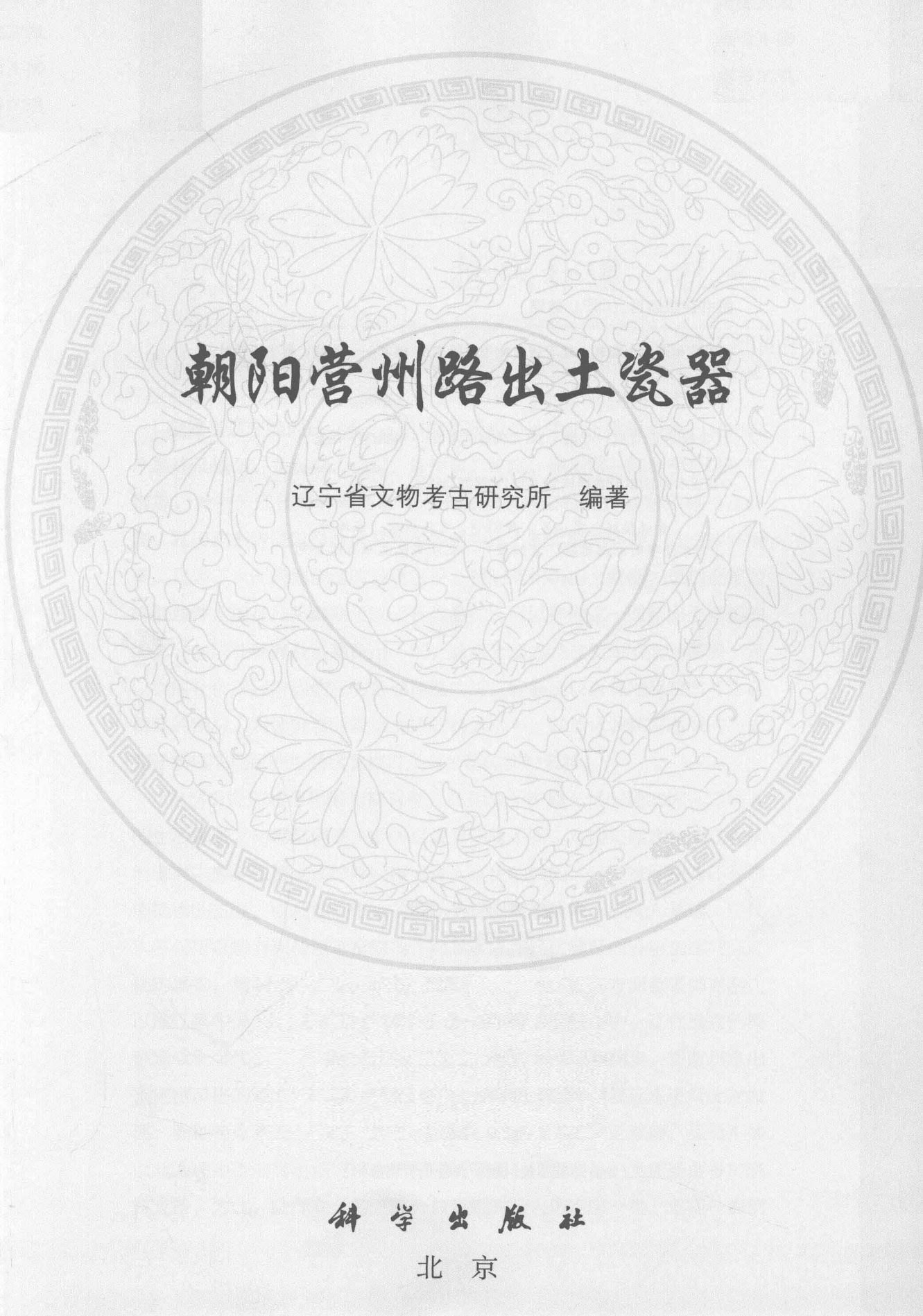


朝阳营州路出土瓷器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朝阳营州路出土瓷器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阳营州路出土瓷器 /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03-032970-7

I. ①朝… II. ①辽… ②陆… III. ①陶瓷(考古)—朝阳市—图集
IV. ①K87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2265号

责任编辑: 宋小军 曹明明 / 责任校对: 宋玲玲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装帧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3/4

字数: 359 000

定价: 2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拾残补遗 抚瓷追昔



——写在前面的话

瓷器是辽宁境内辽、金、元时期墓葬和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文物，产地涉及越窑、龙泉窑、钧窑、耀州窑、定窑、磁州窑、缸瓦窑、江官屯窑等。其中，辽代墓葬和塔基中出土的邢定两窑白瓷、越窑和耀州窑青瓷、湖田窑影青瓷以及金代墓葬和窖藏中出土的定窑瓷器等，几乎件件精美，代表了当时瓷器烧造的最高水平。朝阳营州路出土瓷器，虽然全部为碎瓷残件，但是几乎囊括了以上各类品种，可以称为这一时期出土瓷器的缩影。与以往墓葬及窖藏所出不同，此次全部为经过使用的生活器皿，且以当时社会平民阶层使用的普通瓷器为主，能够比较直观地反映市井生活用瓷的情况，为评价当时瓷器烧造的整体水平，以及认识朝阳古城的历史变迁和城中居民的生活状况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定窑白瓷与越窑和耀州窑青瓷，在相当于中原五代时期就进入辽代人的生活领域。与越窑瓷器主要通过进贡纳收不同，定窑瓷器是伴随辽代统治者向中原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而进入辽代地域的，一同被俘掠的还有烧造瓷器的工匠，以及他们带来的成熟的瓷器烧造技术。以此为基础，辽代人不仅可以拥有和使用定窑瓷器，而且可以在辽代辖区内设窑烧造同类风格的器物，精者在造型、纹饰、工艺、甚至胎釉特点各方面都极类定窑，以致辽墓中出土的部分精细白瓷器物的产地依然在探讨中。辽代设立的瓷窑延续到金代，烧造工艺和器物特点与定窑瓷业的发展同步。将营州路出土定窑风格的芒口细白瓷器与曲阳涧磁村出土的同类白瓷标本进行比对发现，胎釉特点及工艺痕迹仅有几件一致，其余则存在一定差异。虽然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其出自定窑，但是将其确定为定窑产品仍然需要更多的资料支持，为此，陆博女士将这部分白瓷暂时归入仿定窑一类。值得一提的

是，在内蒙古缸瓦窑遗址和辽宁江官屯遗址中，虽然出土了大量覆烧或挂烧使用的垫圈，但是在对两处遗址进行调查时所见大多为内底支烧的粗白瓷，使用垫圈支烧的器物非常罕见，无法提供用以参考的完整实物资料。另外，营州路出土一枚白瓷片也非比平常。此片胎质洁白细腻，釉面光亮莹润，白中微泛青色，从胎釉特点判断，应为定窑白瓷。只是其外壁隐约可见疑似云纹，有的线条呈现五颜六色的光泽，似乎采用了镶嵌工艺，或将纹饰线条有意深刻，使线条处釉层堆积较厚，形成与其他部分表面不同的釉面效果，起到与一般刻花工艺不同的装饰作用。

除白瓷以外，营州路出土定窑瓷器中还有黑釉描金瓷器残片和酱釉印花瓷器残片。《中国陶瓷史》中提到定窑中有金彩描花器，国内仅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白瓷描金一类，见于著录的黑釉描金花器只有两件黑釉描金花卉纹碗，均在多年前流散到日本，分别收藏在根箱美术馆和大和文华馆。由此推测，朝阳营州路出土的定窑黑釉描金瓷片，可能是国内仅见的定窑黑釉描金花器实例。瓷片胎质精白细腻，釉色漆黑光亮，口沿以金彩勾边，内壁描绘金彩花卉纹，超凡脱俗。定窑酱釉印花瓷器在吉林、内蒙古地区已有多例出土，这类器物制作考究，胎体较薄，造型规整，印花纹饰清晰，芒口边沿窄细整齐，从其工艺特点来看，定窑瓷器特征明显。前几例此类器物已被认同为定窑产品。但仔细观察后会发现，这类器物胎色白中泛黄，胎质不够细腻，与前述定窑白瓷和黑瓷相比差别明显。

从辽宁江官屯窑和内蒙古缸瓦窑采集到的标本观察，两地所烧部分瓷器的造型、工艺、装饰等与磁州窑有相似之处，可知磁州窑的产品和技术也应比较早地进入这一地域。但是，从以往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辽代墓葬和塔基中尚未见有被认定为是磁州窑的器物，只是在金元时期遗址中有大量普通类的磁州窑瓷器出土，这些瓷器在绥中出水的元代沉船瓷器中均可见到。营州路出土白地黑彩剔花梅瓶和白釉篦划花纹碗应是北宋磁州窑烧造的典型器物，它们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辽宁地区在辽代也流行过磁州窑瓷器。至于辽代墓葬和塔基中是否已有出土，可以作为一个待解之谜。

辽宁省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内也有古代烧造瓷器的窑

场，《元一统志》中有“利州有细瓷窑一所，在州西南棠叶务”，“粗瓷窑一所，在州东南感化庄”。参考唐宋时期中原窑场的命名方法，我们称其为利州窑。从以往对利州窑的调查来看，利州窑产品主要以外酱釉内白釉、或外酱釉内白釉铁彩绘花的碗盘类器物为主，胎质粗硬，呈灰白色，白釉泛青黄色，口沿无釉。朝阳营州路出土瓷器中即有此类器物，应为《元一统志》中所载粗瓷产品。由于工艺粗糙，虽然早被发现，但并未受到关注。201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吕学明先生及陆博女士一行，对利州窑址进行了再次调查，除继续采集到上述粗瓷标本以外，还发现了白瓷残片。瓷片制作规整，胎体较厚，胎质细密，呈土黄色，釉面洁白失透，内底有一周圆形支烧痕迹。将其与营州路出土的支烧痕迹相同的白瓷碗盘进行对比，发现两组器物胎釉特点一致，于是，大家惊喜地将此类白瓷认定为利州窑瓷器。不仅如此，通过这一发现，可以解决辽宁及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金元时期一批白瓷的产地归属问题。此前，笔者曾推测营州路出土的这类瓷器为山西窑口产品，并将照片传至山西求教当地同行，但是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现在看来，他们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辽三彩是辽代陶瓷中非常具有地域特点的陶瓷类别。因主要出土于墓葬，且基本不见使用痕迹，所以曾被推测为主要属于随葬的明器，不做实用器皿。营州路出土瓷器中的辽三彩器物残片，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与大量生活实用器皿一同出土，应该可以为辽三彩也用于实用器物提供了依据。

营州路出土瓷器中有三块绞胎瓷片和一块绞釉瓷片。其中，绞胎瓷片的纹饰与宋代河南地区窑场烧造的绞胎瓷器相似，但是其胎釉具有自身特点。绞胎瓷器虽然在辽宁周边地区出土不多，但是在内蒙古东部、吉林、辽宁三地都有零星发现。几年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陆菁女士在调查内蒙古上京窑时，发现一块非常小的绞胎瓷器残片，并根据其胎釉特点判断为当地烧造。有些学者对此结论予以否定，并认为该瓷片及辽宁、内蒙古、吉林三地出土的绞胎瓷器均烧成于河南境内窑口。以笔者对辽金时期东北地区出土瓷器的了解来看，如果单凭肉眼观察，这一分歧以及有关辽金时期墓葬、塔基和窖藏中出土的定窑系细白瓷的产地归属问题可能还会

在较长时间存在。原因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中原窑场的历史情况尚未全面了解，而对于辽宁及内蒙古地区古代窑场更是知之甚少。在用以判断的标准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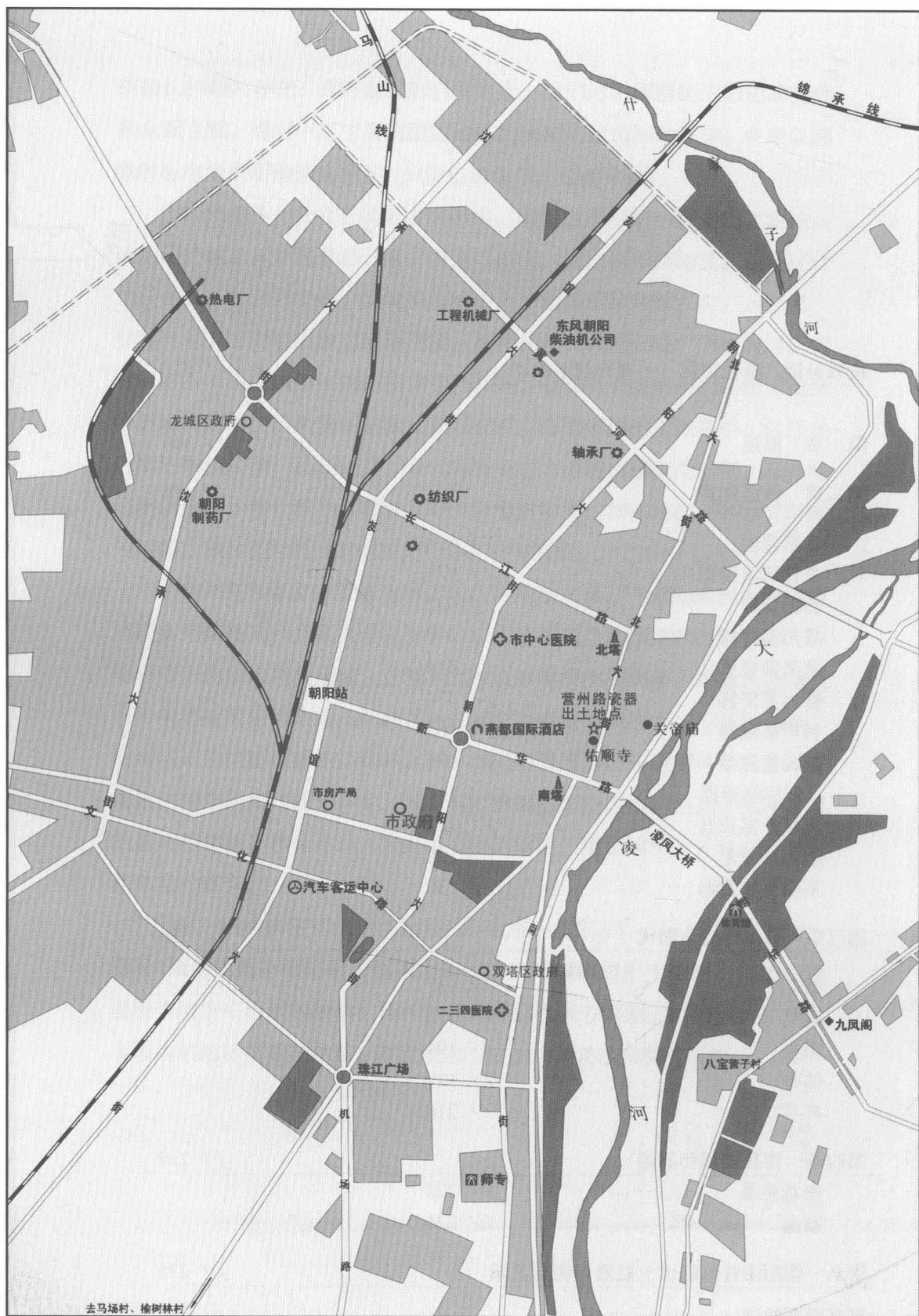
朝阳营州路一带位于朝阳古城以内。朝阳古城发端于慕容氏之龙城，以后历经魏之营州昌黎郡，隋之营州辽西郡，唐之营州柳城县，以及辽金之兴中府，元之兴中州，其间虽几经战火，但相继繁荣数百年。元以后，经明初屯卫的先置后撤而逐渐荒芜。清朝初年，城内已经“荆榛满地，狼虎群游”。从清康熙时期在此建寺时开始，随着有人陆续来此居住，重又始具城市规模，但是繁华富庶已难同往昔。在营州路出土瓷器中，以辽金时期的数量较多，品级较高，元代部分则均为当时普通民用器物，没有发现明朝瓷器。清代器物仅寥寥几件，且极其平常。营州路出土瓷器可以成为朝阳古城由辽至清各时期兴衰历程的实物写照。

“物以古为贵者，贵其造物之人，与用物之事。”营州路出土瓷器虽然没有完整器物，有些甚至只是碎片，但其所蕴含的厚重的历史内涵，依然令今天的世人肃然起敬。它就象是一位穿越时空的老者，伴着大凌河流水千年不变的乐声，向人们娓娓述说着它历经沧桑的往事……抚瓷追昔，在品味这些饱经风霜的碎瓷残片时，我们仿佛置身当年庙塔林立的古城，在不时传来的风动塔铃声中，随着熙熙攘攘的车马人流，流连于招牌各异的茶坊酒肆前，感受当时人们把盏小聚的欢愉，重温这里曾经有过的戎马烽烟前的繁华。

在此，特别感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行们，以对历史的敬仰，将400余件残器补缀粘复并编辑出版了《朝阳营州路出土瓷器》，使已经湮没于地下千百年的故事，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同时，对陆博女士在本书编著中谦虚严谨、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

张松莲

二〇一一年十月于沈阳



营州路瓷器出土位置示意图



拾残补遗，抚瓷追忆——写在前面的话	// (I)
-------------------	----------

第一章 概述	// 001
--------	--------

第二章 各窑瓷器	// 009
----------	--------

定窑瓷器	// 010
景德镇窑瓷器	// 028
钧窑瓷器	// 032
耀州窑瓷器	// 040
龙泉窑瓷器	// 044
磁州窑瓷器	// 054
利州窑瓷器	// 066
缸瓦窑瓷器	// 076
江官屯窑瓷器	// 111
龙泉务窑瓷器	// 121
德化窑瓷器	// 128
不明窑址瓷器	// 130

第三章 瓷器分类与断代	// 135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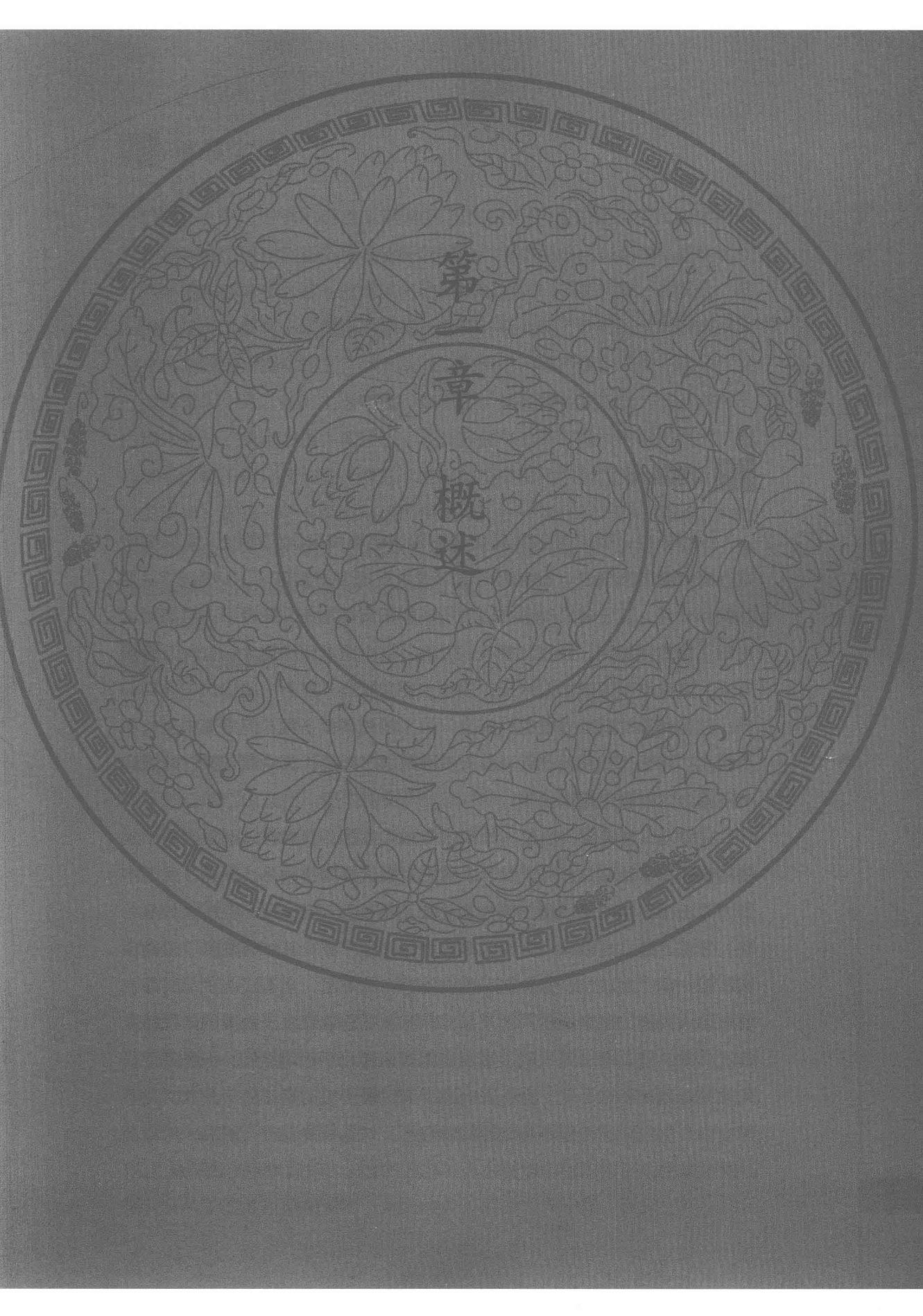
碗类	// 137
盘类	// 172
碟类	// 194
钵类	// 199
杯类	// 218

第四章 青花瓷器和器盖	// 219
-------------	--------

青花瓷器	// 220
器盖	// 224

附录 朝阳市营州路出土瓷器与朝阳古城	// 231
--------------------	--------

写在后面的话	// 240
--------	--------



第一章

概述

概述



瓷器出土

1992年春，朝阳市房产局在朝阳营州路地段建居民楼时，发现在该地存有大量的陶瓷器。接到报告时该遗址已遭到严重破坏。1992年7月至1993年10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朝阳市博物馆的配合下，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经过发掘我们发现，这个遗址面积很大，有一万多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达七八米，遗物主要为瓷器，还有一些建筑构件和陶器。这些瓷器的质地有粗瓷、细瓷，做工粗糙者占多数，但细瓷中也有不少精品。可惜这些精美的细瓷器大多数都成了碎片，其中就包括已碎成瓷片的镶金口的黑定瓷碗。

从1992年夏天起，经过一年多的发掘和整理，我们在该遗址收获了大量的陶瓷器，数量之多令人瞠目。这些瓷器大多为实用品，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碗、盘、碟为其主流，还有盅、罐、瓶、花瓶、粉盒、洗、器盖、盆、灯碗和玩具等。这些瓷器来源广泛，其中有定窑、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耀州窑和钧窑等窑口的产品，也有辽金统治时期在其辖境内兴建的瓷窑所生产的产品。朝阳营州路遗址出土瓷器的年代跨度很大，宋、辽、金、元、明、清到民国时期者几乎都可见到，但经考证，大部分瓷器属于宋、辽、金、元时期，而这段历史时期正处于南北文化不断交融、制瓷工艺发展渐趋成熟的阶段上。对这批瓷器进行研究，可更多地获取朝阳在这段历史中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信息。



地理位置

朝阳位于辽宁省的西部丘陵地区，在古代中国交通还不太发达的时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使朝阳成为沟通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文化联系的重要地带。这一地理优势使得这里的人口不断聚集。在汉代，朝阳就已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魏晋时期，建于朝阳的龙城就坐落在凤凰山西麓的大凌河畔上，河水从城东侧流过，滋养着朝阳的先民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朝阳地区不仅矿藏富足，盛产黄金和煤炭，而且在古代时雨水充沛，草木丰茂，非常适于人类居住与生活。通过历朝历代的开发与建设，朝阳便逐渐成为一座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名城。本图录所介绍的这些瓷器，即出土于今朝阳市区的街道之一——营州路上的一处遗址内。营州路的位置在该市的名寺佑顺寺后身，它东起大凌河，西至竹林街，瓷器遗址就在这条路的东端大小什字街之间。



历史沿革

早在20多万年前，朝阳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遗迹，发现于喀左的旧石器时代“鸽子洞人”即为其例。新石器时代，又有建平的“牛河梁人”创造了灿烂的红山文化。商代晚期至战国早期，朝阳为孤竹国领地；战国中期为燕国辖境，地属辽西郡。秦统一全国后，其地仍沿燕制。汉代曾在朝阳十二台乡袁台子设柳城县，为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所。至三国时期，属魏地幽州昌黎郡。公元341年，前燕皇帝慕容皝在朝阳始建龙城，从此历经前燕、后燕和北燕，史称“三燕”。南北朝时期，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始设营州，隋唐五代因之。辽金时期，朝阳地区为北方的契丹和女真人所踞。辽代曾在这里建霸州城，后又升为兴中府。金代，仍沿袭辽代建置。公元907~1234年，是辽金两代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宋朝相互对峙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内，朝阳地区基本上处于辽契丹人与金女真人的统治之下。由于朝阳地处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腹地，社会比较稳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在这一个时期内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元代初设北京路总管府，领兴中府，后改为大宁路。至元七年（公元

1270年)降府为州¹,朝阳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开始出现了衰落趋势。明代改元的大宁路为大宁卫,隶属辽阳行省,并开始衰变为人烟稀少的牧场。清初,为蒙古人所占据,设三座塔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撤厅置朝阳县,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4年)升县为朝阳府。



瓷器特点

朝阳营州路遗址出土的这些瓷器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许多瓷器留有磨损痕迹,一些还有修补过的铜孔,说明先人们对其不弃不舍,长期使用过;而标着各种符号的瓷器又似乎反映出先人的某种心理祈求;在器底标识姓氏则又似乎是在显示着工匠的手艺。这些瓷器基本上为用来餐饮的碗盘类器物,其中有许多是成套出土的,尽管岁月在流逝,朝代在更替,但这些瓷器的形制却没有太大的变化。此外,在一些器物上还有划“十”字或放射状线条及其他图案,显然,这应是代表一定含意的。

在瓷质上,朝阳营州路遗址出土的瓷器基本上分为两类:粗瓷和细瓷。粗瓷器在其总量中占了三分之二,其釉色以白釉和酱釉为主;而细瓷只占三分之一,有白釉、青白釉与青釉等。粗瓷胎内有细小的砂粒和黑斑,胎色有灰、灰白、白色或黄白色等。细瓷的胎质则细腻得多,多数呈乳白色。在釉色上,则可谓为丰富多彩,有白釉、酱釉、黄褐釉、青釉、黑釉、绞釉、绿釉等,其中以白釉器的数量为最大,酱釉器次之。其中粗瓷中的白釉和酱釉瓷器的外壁多数挂化妆土,施半釉,露胎处有流釉痕,制作不甚规整。与粗瓷相反,细瓷器形制作规整,不挂化妆土,施全釉,釉色通透,大部分有芒口。在装饰手法上,有刻划花卉、印花、花口、绞胎绞釉、黑釉堆线、酱彩描绘等。在烧制工艺上,有匣烧、挂烧、叠烧和障火烧等,辽阳江官屯窑的瓷器还见有以支、顶、挤、垫的方法入窑装烧工艺。在器形上,有碗、盘、碟、钵,并占很大的比例,共占百分之八十;其余为罐、瓶、粉盒等。虽然这些碗、盘、碟、钵制作都较为简单粗糙,但也不失为古朴与实用。碗的形制可分为三种,即斜壁碗、

1 《元史·地理二》1397页,中华书局,1976年。

斜壁微弧碗和弧形曲壁碗。盘的形制有折腹盘和斜弧腹盘。碟的数量相对很少，其式样小巧并且浅底。钵的形制为直口、深腹、弧底。罐的形制则多为短颈、鼓腹、圈足，少量的罐肩部有系。瓶则为小口、短颈、鼓腹，肩部也有三至四系。在这些瓷器中，凡属来自当时名窑的器物，胎质都较细腻，器形规整，尤其是属景德镇窑的几件瓷器，做工极为精致，胎薄釉透。而龙泉窑、磁州窑、钧窑等，其胎质虽然较细，但造型却显厚重。属于清与民国时期的青花瓷也应来自民窑。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器盖，说明罐、瓶的数量应该不在少数。但因遗址被破坏之故，这些罐和瓶等器物均已不知去向。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还收集了许多瓷片，从胎质和釉色上看，原应是这些瓷器中之精品，如极为珍贵的黑定瓷片，口沿镶着金边，在全国尚属罕见。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瓷器专家耿宝昌先生鉴定，为国家一级瓷片标本。还有一些瓷片，应是非常精致的罐、盒、枕之残片，惜因缺失太多，不能复原，只好将其作为鉴定窑口的标本附之于后，以供参考。

朝阳营州路遗址出土的这些瓷器，出土数量多，时代跨度大，为研究朝阳地方历史和瓷器的窑口提供了最详实的资料。甚为遗憾的是，此处遗址在考古勘探和发掘之前就已遭到严重毁坏，不仅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而且也给后来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窑址考证

宋、辽、金、元时期是我国瓷器制造业蓬勃发展时期，全国名窑遍地，各类瓷器制作得精美绝伦，惊世骇俗。这些名瓷的大量出现，带动了地方民窑纷起仿制，使瓷器产品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朝阳营州路遗址出土的这批瓷器就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状况。这批经发掘和整理出来的瓷器，已修复者有400多件，其中有宋代的定窑、景德镇窑、耀州等窑产品，也有金代的定窑、钧窑、磁州等窑产品，还有元代的钧窑、磁州窑、龙泉等窑产品。这些产品绝大部分为民用瓷，其制作风格鲜明，工艺特点突出，因此在瓷器窑口的划定上也比较容易。除此之外，更多的瓷器则是出自辽金辖区境内的地方窑场，而且这些窑口又多以模仿制做中

原名窑瓷器为主，所以对其窑口的判断尚较为困难。因与这些瓷器有关的窑址大多未经发掘，缺少可靠的依据，故只能依据在各窑址所采集的标本和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年代相同或相近的瓷器作为参考。辽金时期，中国北方为契丹和女真人统治地区，在这两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宋王朝不断进行战争和掠夺同时，中原瓷器也随之大量流入北方地区，这些瓷器的流入，也深深地影响着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在南北方的民族交往中，中原窑工也进入北方，将生产瓷器的技能带到当地，为辽金境内地方窑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使北方瓷窑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些窑场就我们所知，大型有赤峰缸瓦窑、辽阳江官屯窑、浑源界庄窑和北京的龙泉务窑等，小型的如辽宁喀左利州窑及《元一统志》中记载的（朝阳）兴中州北白瓷窑等。产品都以生产普通平民生活用品为主。根据已发表的一些相关资料和我们对这些瓷器的整理发现，朝阳营州路遗址所出土的瓷器大部分是来自这些窑场。现今，北京的龙泉务窑已经正式发掘，其发掘报告集可作为研究这些瓷器的一个参照；其他的窑址虽然还未经发掘，但是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多次调查，在这些窑址里采集了大量瓷器标本。据此，我们得以了解和掌握了这些窑场制作瓷器的一般特点：如辽阳江官屯窑的产品大多为粗瓷，施半釉，露胎处呈火烧红色，在器壁上均挂有白色的化妆土，以增加釉色的光洁和白度；赤峰缸瓦窑的细瓷制作比较精细，满釉，瓷化成度较高，与定窑相似，但数量很少，很难见到。粗瓷的数量很多，其间也有区别。较好的胎质细白，略有杂质，较差的胎质可见有明显的砂粒，但从露胎处我们也可看出其打磨的很细。胎色以灰白色为主，还有灰褐色或淡红色，釉作象牙白色，微泛青，光亮但无温润感；而喀左利州窑瓷器的釉色大多都呈酱釉和内白外酱或内白外黑的颜色，细瓷很少，多为粗瓷，胎质黄白。至于北京龙泉务窑，因已有发掘报告出版，其瓷器特征交待详明，在年代的划分上也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线索，这在本图录的分类与断代中会详细加以说明，此不赘述。



梳理时代

因朝阳营州路遗址曾遭到严重破坏，故这些瓷器的出土层位不详，给

断代带来极大困难。为尽可能地确定这些瓷器的年代，需要做的工作是：首先，以有明确出土纪年的辽、金、元时期瓷器作为依据，尤其是已发表的属于这几个时期内的几座大型窑址所生产的瓷器，为朝阳营州路遗址出土瓷器的断代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依据。参照这些资料，可判定营州路遗址出土的瓷器其生产的大概时间。实际上，由于这些瓷器的时代跨度较大，要精确确定每件器物的年代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只能对其年代作大致的分割，如只分出辽、金、元等时代，而对各代中的早、中、晚期则简而略之。其次，发现于墓葬、窖藏、塔、寺庙内的瓷器多有纪年，是我们对这些瓷器进行断代的极好参照物。这里我们更多的是依据墓葬和窖藏中出土瓷器资料，通过仔细地在造型、胎质、釉色、工艺等方面进行比较，来确定朝阳营州路遗址所出土的每件器物的确切年代，并将找出相关的瓷器资料作为注释附于营州路遗址出土的每件瓷器之后。再次，一些学者对辽、金时期其辖地境内各窑瓷器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划定这些瓷器的时代提供了依据。辽、金、元均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的三个朝代，其生活习俗和工艺传统用具有着许多相通之处，而瓷器的形制也多有相同和相似之处。尤其是这三个朝代在其统治期间，不断地与汉民族在文化及生活上的融合，差异逐渐缩小，因此，在时代的划分上，我们只能是根据其间的细小的变化进行鉴别，故也很难以做到十分准确。



本书体例

在本书中，根据上述窑场生产瓷器的特征，参考已发表的宋、辽、金、元时期的瓷器资料，我们对朝阳营州路遗址出土的瓷器进行了仔细甄别和归纳，并将已整理出来的400多件瓷器作为原始的资料提供出来，目的是希望能在瓷器分类和时代划定方面得到各位专家和同行的帮助。在本书的结构上，我们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章为概述，介绍基本情况。第二章，将窑口和时代明确的瓷器放在前面，以此作为本书的主体，并对每个窑的特色和相应的营州路出土瓷器作一个简单的说明，窑口不明但又较为有特点的瓷器附列于后。第三章，对朝阳营州路遗址出土的瓷器的大宗——碗、盘、碟、钵按其器型进行统一分类；在器型

分类中，主要根据形制、胎质、釉色和装饰工艺上的差别进行排列组合，并通过这种排列进行比较，找出共同点，依据其他考古资料，尽量弄清每件器物的生产年代和窑口。第四章，朝阳营州路遗址还出土了几件青花瓷器和一些在形制胎体与釉色均有差别的器盖，其数量不多，简而述之。附录为一篇研究文章，题为《朝阳市营州路出土瓷器与朝阳古城》。文中对整理这些瓷器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结合朝阳古城的历史沿革和文化背景进行了初步探讨。最后一部分对整理朝阳营州路瓷器的过程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对来自多方的帮助欲以感谢，而在其中所感悟的东西谈一下感想，是为结语。